

## 民国时期人口思想初探

张庆军

民国时期,人们为了探求中国“积弱”的病因和救国良策,对人口问题曾予以关注。曾在西方社会产生轰动效应的马尔萨斯人口论,在中国也引起了反响,并对这一时期中国的人口思想发展造成了强烈的影响。本文拟就民国时期的人口思想作一初步探讨,以就教于大家。

### 一

人口思想是一定历史条件下人口现象在人们思维中的反映。清代乾嘉以后人口的迅速增长以及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持续不断的动荡,致使限制人口发展的观点在民国时期得到不少人的赞同。特别是马尔萨斯人口论的传入,更为这股思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以致发展到后来,甚至有为政府推卸施政无方责任之嫌,即把当时中国社会一切问题均归结为“人口过剩”。

但是,持相反观点者也大有人在。这些人认为,在中国国势岌岌可危的情况下,增殖人口是保国保种的关键所在,而生产力的发展是解决中国人口过剩问题的重要手段,在这部分意见中,孙中山的思想具有代表性。

孙中山承继了中国传统社会的观点,认为一个国家和民族人口的多少,将直接影响到它的兴亡盛衰。他指出:“国以民为本”,<sup>①</sup>中国自乾隆以后,人口增长的势头已经减慢,而“外国人口日日增多。”“从前满洲人不能征服中国民族,是因为他们只有一百几十万人,和中国的人口比较起来,数目太少,当然被中国吸收。”而现在,“各国人口所以一时不能来吞并中国的原因,是由于他

们的人口和中国的人口比较,还是太少”<sup>②</sup>。孙中山在此提醒国人,设想“到一百年以后,如果我们的人口不增加,他们的人口增加到很多,他们使用多数来征服少数,一定要吞并中国。到了那个时候,中国不但是失去主权,要亡国,中国人并且要被他们民族所消化,还要灭种。”<sup>③</sup>孙中山甚至将列强人口增加的压迫视为民族主义的三大问题之一,可见他对此重视程度之高。

孙中山的追随者廖仲恺也主张中国应继续发展人口。他认为:“人口增加,断不会到可怕的程度,用不着那些灾害、罪恶、战争种种为人道之敌的东西限制,也不怕国家发达、文明进步之后,人口会弄到领土装不下的,所以‘人满之患’终归是一句傻话罢了。”<sup>④</sup>

除此以外,持上述观点者在民国时期虽不占优势,却始终有之,其理由大体不出以下几点:

1.从战争的角度考虑,反对中国节制人口。民国时期,不仅中国社会,而且整个世界都处于多事之秋,两次世界大战均在这一时期爆发,因此有人认为“人力即国力”,“中国人如想在国际战争中取得胜利,应当奖励人口,不应节制人口。”

2.认为节制人口将造成劳动力资源的减少。近代和民国时期,劳动力数量的多寡仍

① 《上李鸿章书》,《孙中山选集》(上)16页。

② 《三民主义》,《孙中山选集》(下)600页。

③ 《三民主义》,《孙中山选集》(下),601页。

④ 《廖仲恺集》,《中国人民和领土在新国家建设上的关系》。

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另外,劳动力是构成生产力的要素之一,因此,有人认为:“人口减少,生产力便会降低”。

3.认为增加人口将促使中国荒地的开发。许多人列举出大量的荒地统计资料,以“证明中国现在还有许多可耕的地没有变成已耕地。为充分利用这些荒地起见,中国应当增加人口,不应节制人口”。

4.认为中国工业化的发展将有助于最终解决中国的人口问题。在他们看来,传统上的中国以农立国,只要走上工业化的道路,就会缓和人口压力。他们还考察了中国的人口数量和密度,指出“中国的人口虽然众多,但从人口密度一点看去,中国还在英、比、德等国之下”,“将来工业发展之后,还可以吸收许多人口,还可让中国的人口密度提到与英、比、德等工业化的国家一样。”另外,随着文化教育的发展,妇女的解放,将促使结婚年龄的提高和生育率的下降,这些将自然地促成人口增加速度的缓慢。”<sup>①</sup>

但是,上述主张在当时人口问题讨论中的声势远比反对者弱,大多数人口学者则更强调中国人口多所造成的压力。他们不赞成孙中山的人口观点,“国父固重视人口压迫,但严重性尚在百年之后。”现在中国人数与任何国家相比,都占绝对优势;中山先生讲‘民族主义’,怕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寡不能敌众,有灭种之虞,未免过虑矣”。<sup>②</sup>他们对“人力即国力”之说提出了批评,如若“民数虽众,非弱即贫,非贫即昧,一旦与他族接触,遂毫无抵抗之力,致已有之领土及已有之生计,亦不能自保。”<sup>③</sup>人口学者陈长蘅在其早年著作《中国人口论》中即下定论:“一国人口太稠,生育太蕃,实与人民个人之发达,本身之福利,有种种妨碍。”他还从人口的数量与质量,人口增加与社会物质财富增长等各方面关系进行了论证。该书1918年初版发行,至1926年即发行七版,可见当时其影响。

除陈长蘅外,尚有其它一些当时著名的人口专家及学者如许仕廉、翁文灏等人赞同所说,并对此问题展开多方面的研究。

许仕廉曾考察了中国的人口密度。当时的人口密度为每平方里102人,与西方国家相比并不为甚。但是中国“人口分配不得法”,江浙一带的人口密度与西北边远地区本不可同日而语,“一国内人口分布之不均,莫中国若”。因此“在今日人口分配未均,生产效率低微时代,必须节制生产(育),以减少生存竞争。”<sup>④</sup>。

为了论证中国是否已存在着“人满之患”的现实,不少人对中国的人口及土地的利用进行了考察。曾任南京政府国防设计委员会委员的翁文灏在1932年撰文强调中国可利用土地的稀少和开发的困难。”假使我们真要平均地产的话,我们每个人大约只得三亩田地,世界上真不容易找得出比我们再穷的国民。”翁的观点得到一部分人赞同。他们进一步认为,减少人口,已为救国“唯一的根本良法”。否则,照中国现在每年增加的人口看,即使把东北、西北垦殖了,“也仅能敷衍十五年,届时人生依然穷困,中国人口问题的严重分毫不减。”<sup>⑤</sup>。

还有人对发展工业化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观点提出怀疑。当时在人口问题讨论中风头很健的吴景超指出,一个国家的人民要想改善生活,莫过于生产方法的改良,而生产

① 上段引文请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人口局档案及吴景超所写《中国人口问题》,此文载《独立评论》225期,1936年。

②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人口局档案。

③ 陈长蘅:《中国近百八十余年人口增加之徐速及民势之变迁》,载《东方杂志》24卷18号,1927年。

④ 许仕廉:《民族主义下的人口问题》,《东方杂志》23卷16号,1926年8月。

⑤ 翁文灏:《中国人口分布与土地利用》,载《独立评论》3号,1932年6月。

⑥ 张印堂:《中国人口问题之严重》,载《地理学报》创刊号,1934年9月。

方法的改良,则需要增加资本的供给。他以美国为例进行了计算,认为中国在发展工业化中所需要的资本,有8280亿之巨,这在贫穷落后的中国,几乎是天方夜谈。这一设想所以不可实现,他认为其症结在于中国人口太多,“假如我们的人口减少,我们(所需)资本也就减少了。”因此,他得出结论,如果不控制人口,想赶上英美国家,“大约是不可能的。”<sup>①</sup>

在持“节制人口”说的阵营中,当时即有人发现,他们多半是专门研究人口、土地或经济的学者。这些人一方面由于在其研究领域有较深的造诣,观察问题也更细致,因此提出的意见也比较尖锐;但另一方面,由于受西方人口思想特别是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影响又囿于专业的偏见和狭隘,将一切社会不良现象均归之于人口问题,出现了偏颇、激烈,甚至为政府推诿责任的倾向。

## 二

尽管在当时人口思想领域存在着对立的两种观点,但无论就人口增殖论者或节制人口论者来说,都相继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虽各有偏重,但都把焦点集聚在提高中国人口质量问题上。孙中山指出:“欲造成神圣庄严之国,必有优美高尚之民,以无良民质,则无良政治;无良政治,则无良国家。”<sup>②</sup>陈长蘅同样强调,“一个国家民族要想永远适存于世界,不但要靠人口数量,更是要靠人民品质的优越。”<sup>③</sup>这种对立双方的认同,正反映了当时中国人口发展所存在的一些实质性问题。

谁也不可否认,当时中国的人口质量极其低下,孙中山在一次演讲中指出:“我们中国人现在的痛苦每日生活总有三万万人朝不保夕,……现在的中国不但是最贫弱的国家,并且是最愚蠢的国家。”<sup>④</sup>

许仕廉则从东西民族人口体质上进行了比较,他指出,无论从其人的重量、高度、血液、寿命、智力发展程度等各方面来说,

中国人均不如西方。

不仅如此,中国人的后天环境更较西方为劣,在西洋“养儿之学,立有专科;为个个女人所必习。医学发达,保护孩童及成人,无所不至。更立特别游戏场等,使儿童有充分发展的机会,注重体育,讲求卫生,使身体强健,寿命延长。故在西洋各国,人人有青年奋发有为的气象。在中国不然,不孝有三,则尝闻之;儿童养育,未之学也。体育不发达,卫生不讲,处今日政治及社会制度之下,中国小孩绝无充分发展的机会。致全国暮气沉沉,不生不死。”<sup>⑤</sup>

在如何提高中国人口质量问题上,孙中山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要使中国富强,不被帝国主义侵略,就必须提高中国人的道德素质,发扬中国传统的道德思想。这里,孙中山没有超越近代洋务派的见解,认为中国所长者乃在于传统的道德准则,即忠孝、仁爱、信义、诚意、正心、致知格物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前中国民族的道德因为比外国民族的道德高尚得多,所以,在宋朝,一次亡国到外来的蒙古人,后来蒙古人还是被中国所同化。在明朝,二次亡国到外来的满州人,后来满州人也是被中国人同化”。因此,只要中国人“有了很好的道德”,就可以使国家民族“长治久安”,“并且有力量能够同化外来的民族。”而“外国的长处是科学”,中国人在加强自己道德素质的同时,学习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提高整个中国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这样“十年之后,虽然不能超过外国,一定可

① 吴景超:《工作化过程中的资本与人口》,载《观察》三卷3期,1947年。

② 转引自陈长蘅文:《我国人口的三种压迫与其解救方法》,载《中报月刊》1卷4号。

③ 陈长蘅《三民主义与人口政策序》。

④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人口局档案。

⑤ 许仕廉:《民族主义下的人口问题》,载《东方杂志》23卷16号,1926年8月。

以和他们并驾齐驱。”<sup>①</sup>

而节制人口论者则更多强调通过节育和优生的途径提高人口质量。陈长蘅就一直鼓吹和宣传“节孕”与“优生”两个“并蒂连理”的大运动，并得到了许多人的赞同。他们对中国的死亡率进行了考察，认为中国死亡率过高的现象已足证中国人口质量低下，而这一切最主要的原因，则在于生育率过高。”由种种统计，皆可证明生育愈多，死亡率愈高，其最大原因皆由于为母者养育太繁，气血衰弱所致。所以我们的结论是每双健全良好的夫妇……养子期间不宜过密。”<sup>②</sup>

吴景超也同意这一观点他说：“中国的婴儿，与他们的母亲一样，吃尽了生育不能节制的苦，因为他的弟妹源源不绝而来，所以他应当得到的照料，都给他的弟妹分去了。”这样必然造成孩子生理成长及心理成长所需的物质及精神生活资料的不敷分配。另外，他还要求身体孱弱的女子以及有遗传病的人，都需要节育的知识来保障他们及其家庭的幸福<sup>③</sup>，以提高人口的质量。

从上述言论看，无论鼓励增殖人口者还是反对者，他们都意识到提高人口质量是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关键，但是偏重点却各有不同。如孙中山认为人口的增加与人口质量的提高并行不悖；人口数目与质量提高，将增强民族生存竞争能力。而反对派却认为，要想提高中国的人口质量，就必须首先节制人口，只有减少人口，才能使社会上每一分子享有的生活资料相应增多，教育条件有所改善，优秀人口则必然增加，从而必然促进种族的优越化。

应该指出：尽管人口素质有作为身体素质的自然属性和文化素质、思想道德素质的社会属性两个方面。但人口素质的本质特征是社会属性。人口素质作为现实的生产力，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变化的。作为人口总体的人口素质，是由社会生产方式决定，总是受到社会制度和历史条件所制约，它取决于

已经获得的生产力；不能有任何主观随意性。上述两派有关中国人口质量的观点都出现了这样的缺陷，即离开了原来的历史条件去抽象地谈论人口素质，如果不以新的先进的社会生产方式取代旧的落后的生产方式，生产力没有一个质的飞跃，而去侈谈提高人口质量，只能是缘木求鱼。

### 三

民国时期，中国的人口思想水平出现了新的提高并表现出了时代的特点。

（一）专业队伍的出现及研究领域扩大。民国以前，中国人口思想虽然堪称丰富，也有众多的思想家提出了一些卓有见地的认识和命题，但就总体情况看，他们大都将人口问题作为其治国思想中的某一项措施意见而少有系统性的理论。到了民国时期，由于人口问题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问题之一，西方的人口理论也大量被介绍进来。新一代人口学方面的专家开始在这种环境中出现。如陈长蘅、许仕廉、吴景超、陈达、柯象峰、孙本文等等。他们对人口问题有系统的研究，理论上较深的造诣，著述也甚丰。如陈长蘅的《中国人口论》、《三民主义与人口政策》，许仕廉的《中国人口问题》，陈达的《人口问题》、吴景超的《第四种国家的出路》、孙本文的《现代中国社会问题（人口问题）》等等不一而足。另外散见于各种报刊杂志上的文章更是比比皆是，遂引起人们的重视并在社会上造成一定的影响。

除了这些专门学者外，一些政治家、经济学家、政府官员也对人口问题予以了关注，如孙中山、廖仲恺、马寅初、翁文灏等等。由于他们从不同角度去观察问题，又加之专业知识丰富，因此往往能触类旁通，提出一些很有见地和份量的意见，从而使这

① 《三民主义》《孙中山选集》（下）。

② 孙本文：《现代中国社会问题（人口问题）》，175页。

③ 吴景超：《第四种国家的出现》，184页。

一时期的人口思想更加丰富。

人口问题的研究范围和领域也明显拓宽。中国古代的人口理论所讨论的范围主要局限在人口的多寡与治乱关系等。民国时期的人口研究则显示出多侧面、多角度的特点,即对人口的数量、质量、生育率、死亡率、人口的生物结构、社会结构,人口发展的规律、分布、迁移,人口和经济的、社会的、资源的、文化的关系等各方面问题进行了研究。与民国以前相比,这一时期的人口研究,在理论上显得精致,内容上更见丰富。

(二)广泛展开了社会调查活动。人口作为生产力的主要要素之一,是一个国家的重要资源,也是政府收取赋税的主要依据。因此,对人口的调查在中国古代就已展开,但大都局限在对户籍、人丁数量的调查上。民国以后,这种情况得以改变。这不仅表现为民国历届政府曾为此建立了专门机构,为加强赋税管理和对人民的控制,举行过几次较大规模的全国人口普查。一些学者与学术团体机构也广泛地展开了实地调查,如金陵大学就曾专门组织人力对江苏一带农村人口概况作过调查;许仕廉则对全国人口的年龄结构进行过考察分析。这些调查的内容比以往细致、丰富,对人口的数量、年龄构成、婚姻构成、教育构成、地区分布,几乎均有涉及,为一些新的理论和观点的建立和提出提供了数据。翻阅一些当时的人口著作,就可看出,大都对统计数字和调查材料十分重视,并不仅是泛泛而论和空洞的清谈。

(三)吸收了西方的人口学理论;民国时期人口思想非常丰富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广泛地吸取了西方的人口学理论。举凡当时西方流行的一些学术流派,无论经济学派、生物学派,还是统计学派,都可以在中国找到它们的影响。其中最盛行的,当推英国的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

在民国时期,一些学者试图用马尔萨斯

的人口思想作为理论指导来表现中国人口规律。余天休、余文铎联合撰文表明他们的看法:“人口生殖之速率,远过于物产增加之速率,故经若干年,物不加之多,而人口日增,必不足以图存。”中国“四五千年之历史,一治一乱之局面”,“其为人口过剩之产物,人为淘汰之结果,则孰敢致疑。”<sup>①</sup>而翁文灏则通过对中国土地资源的考察更被马尔萨斯的理论所感染,他总结说:“所以中国土地虽广,但人口迫压已到世界少见的严重。”要减少这种迫压只能有两条路,“一是内乱,互相残杀之后使得人口减少暂得小康,但太平之后人口又增,内乱又起,如此周而复始,中国历史战乱的循环周期,一定与人口增加率有密切关系。第二条路则是拓荒移民,但他认为在目前情况下只能是凭空想象,随意空谈”。<sup>②</sup>

但是,民国时期的思想界已同近代社会大不一样,随着西方各种社会思潮的涌入,人们已不再象初期那样盲目吸收,而是增强了辨别、抉择、批评的能力。对于马尔萨斯的理论,孙中山就曾力斥其非。他将法国与中国的情况进行了比较:“法国的人口是四千万,中国的人口是四万万,法国土地的面积,为中国土地面积的二十分之一……中国土地的面积,比法国大二十倍,如果能够仿效法国来经营农业,增加生产,所生产的粮食,至少要比法国多二十倍,法国现在可以养四千万人,我们中国至少也应该可以养八万万人。”<sup>③</sup>他针对马尔萨斯及国内主张减少人口的观点进行了抨击,认为中国的土地只要利用得法,完全可以养活更多的人。他一再以法国为例,认为如果受马尔萨斯理论的影响,将人口减少,则不利于国家民族的

① 余天休、余文铎:《中国人口问题解决之必要》,见《人口问题资料》,49页。

② 翁文灏:《中国人口分布与土地利用》,载《独立评论》3号,1932年6月。

③ 《三民主义》,《孙中山选集》下,807页。

兴旺。这里，孙中山仍然按传统的大国庶民的观点对马氏学说进行批判。

廖仲恺则接受英国近代生物学派人口理论的奠基者斯宾塞的观点，即个体发展的个性化过程同种族延续的生殖过程成反比关系；个体发展自己个性的精力同生殖力成反比关系。他依此批驳马尔萨斯人口论，认为随着科学技术水平和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虽然“人民的平均寿数”会高一些，但由于个性的发展和受教育程度的增高，人们用于生儿育女的精力自然减少，因此中国将不会存在“人满之患”。<sup>①</sup>

即使一些人口节制论者，他们对马氏的人口理论也并非完全接受。人口学者许仕廉虽然对马尔萨斯的一些观点十分欣赏，但同时又认为“人口问题之全体，非仅为人口多寡之问题，凡人口之品质，经济之效率，与分配之平均，皆在其中。”他们已逐渐注意到马尔萨斯理论的一个重大缺陷，即将人口现象仅看作自然现象而抹煞掉它的社会属性及社会生产方式给其的制约，力图在他的学说基础上作出更完整的解释。

从国人对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反应可以看出，如同在思想界一样，人口理论方面也显

得繁荣纷杂，人们已经有能力在比较西方各种社会思潮的过程中进行甄别，而这种能力的形成，重要的一点即在于对这些西方新思想新理论的了解和熟悉。从一些资料分析，在当时人口理论界，几乎对任何一种西方人口流派都不陌生，诸如生物学派的斯宾塞、数学派的法国人基雅尔以及美国人口学家凯莱、德国的沃尔夫等人，他们的学说与观点往往被中国的这些学者们信手拈来，从容论道。

尽管民国时期中国的人口思想十分丰富，但也显得纷杂，各种学说杂糅并进，一时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仅以对马尔萨斯人口论的介绍和批判中就可以看出，无论赞同或反对者，都没有从真正意义上发现马氏学说的真正实质乃在于为剥削制度辩护并反对任何社会改革。这种现象的出现与马克思主义的人口理论在中国未能得到广泛传播所致，同时也与旧中国的人口学者受到当时社会条件和其所受教育环境的限制有关。

（本文责任编辑：王跃生）

（作者工作单位：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sup>①</sup> 《中国人民和领土在新国家建设上的关系》，《廖仲恺集》。

（上接第53页）

培训、晋升和发展的机会。同时，妇女往往由于生育责任的牵绊而要中断工作生涯，个人事业发展受到极大影响。

从被访的大陆移民家庭看，新移民家庭缺乏社区的指导和帮助，邻里关系淡薄，缺少互助，家庭主妇“忙透”，常被困难和烦恼所困扰，育儿阶段的家庭尤甚。

建议有关方面，第一，注重幼儿教育事业的发展，为六岁以下的幼儿提供一套统一的、质量并重的服务，聘用众多女性的机构应有儿童日托中心；第二，提高家务劳动社

会化程度，鼓励男女共同分担家务及育儿的责任；第三，提倡建立亲切互助的邻里关系，睦邻互助，可减少不必要的问题发生，主妇们又可扩大生活圈子，开阔视野，增进生活兴趣，又可在紧急的时候，找到援手；第四，加强对这批女性的教育培训，提高文化及技术水平，拓展她们的知识领域，提高社会的投入感和参与能力；第五，加强对新移民的生活和社区指导，帮助她（他）们更快地适应环境，较平稳地度过适应期。

（本文责任编辑：洪映）

（作者工作单位：上海复旦大学人口所）